

距離的價值

凱文·羅賓斯
倫敦大學教授

富蘭克·維伯特
伯明罕大學教授

譯者：

何朝陽
中國科技大學外語系副教授
zhaoyanghe@hotmail.com

王希華
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傳播與
科技政策系副教授
xihuaw@ustc.edu.cn

摘要

本文是《技術文化的時代--從資訊社會到虛擬生活》一書第十一章的一部分。作者對虛擬空間，即由新的資訊和傳播技術創造的網路空間的性質和意義作出深刻獨道的剖析。作者本著自己一貫的批判性立場，圍繞威廉·米切爾的《比特之城》一書，深入審視時下流行的現代技術文化的觀點，指出與眾多未來學家熱烈歡呼的消除距離、重創人類的居留地的觀點正好相反，作者認為新技術創造的沒有距離的空間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空間，一個被撫慰的空間，新技術通過消解有意義的外部現實--真實的距離，而促使了真正的社會生活與經驗資源的枯竭。

關鍵字：技術文化 虛擬空間 距離

[收稿]2002/8/16; [接受]2002/8/30; [修改定稿]2002/10/16

本文章將探討現在通常稱作的虛擬空間----即由新的資訊和傳播技術創造的網路空間的----性質和意義。從總體上說，它具有一種解放性的潛能。琳達·哈拉斯姆(Linda Harasim)因而對新技術理想主義表達了熱情洋溢的讚賞，認為數位化網路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環境"。"網路已成爲人們進行交易、合作幹活、解決問題、組建專案、私人對話或社會交流的聚集地。" 她繼續說。對這新的歡樂空間的出現有一種急切的渴盼："網路世界爲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聚集場所，它提供了新形式的社會言論和社區。"¹ 斯蒂芬·格拉漢姆(Stephen Graham)即使用的是個與此全然不同的術語----源自角色-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他表達的意思也基本相同。他認為這是一個"新技術如何將人類角色與技術產品包融於複雜、偶然和微妙的混合體之中以形成角色網路"的問題。虛擬文化被認爲是人類、技術和空間的一種新的聯接，以"密切和重組"爲特徵，並形成被稱爲的新的"理性的集合地"。虛擬社區這一新技術前景以多重的"跨越空間的社會技術關係的體系"----以密切理智的和交往的聯繫連接本土與非本土的體系----存在。² 琳達和斯蒂芬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虛擬技術內在潛力寄於的共同期望：增強傳播，開創新的、更具創造性的促進人類聚合的方式及擴展人類的社交形式。

這些描述存在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正是本章將要闡述的。我們不是懷疑新技術的功效----其實我們承認虛擬技術完全具有形成這種新的傳播與社區模式的潛能。我們要探討的是隨新技術爲生的這個或這若干個的社會空間----這個舒適地合作、對話、理解、親密、往來等

¹ 琳達·哈拉斯姆(Linda Harasim)，"網路世界：作爲社會空間的網路"(Networlds: networks as social space)，載琳達·哈拉斯姆編輯的<全球網路>(Global Networks)，康橋、麻省，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14-17、34頁。

² 斯蒂芬·格拉漢姆(Stephen Graham)，"地理的終結或場所的劇增？界定空間、場所和資訊技術的概念"(The End of Geography or the Explosion of Place? Conceptualising Space, Pla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人文地理發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8年，第22卷，第2期，第167、187、178-79頁。

等的空間----的性質。它雖因一種相互依存的微妙想象與一致而顯得資訊豐富、無所不包，但我們認為這是個很平凡的空間。這個新的虛擬空間是個被撫慰的空間。是比爾·蓋茲所說的"無摩擦"地進行交流的、受駕馭的世界。正如斯拉沃·茲查克(Slavoj Zizek)所觀察的，它喚起的是一種理想，渴望"一種完全透明、極其靈妙的交換媒介，物質慣性的最後痕跡在這消逝"。³ 這是個虛幻的空間。

下面我們將從病變(pathology)的角度，而不是像技術文化描述的那樣，從進步和潛能的角度，來思考虛擬空間的理想。我們或許可以從更為寬泛的背景思考這個問題，即劉易斯·薩斯(Louis Sass)所指的，現代文化在認識脫離現實和丟失與世界的實驗性關係上，存在一種固有的剛愎、固執的趨勢。這是一種讓世界失去它的真實和他性，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人類反響和意義的趨勢；一種使整個世界的真實性和差異性日趨減弱，因而使人類存在的意義和相互間的共鳴日益喪失的趨勢。⁴ 因此，我們認為虛擬文化受這樣一種欲望所驅使，即試圖征服複雜、困難和分離，這些全是現實地理中存在的。但我們認為只要有有意義的社會交往和經歷，就一定存在有這種不通融的地理。因此我們贊同無序的存在。我們與程式化空間"無摩擦"的理想觀點不同，我們認定現實空間中的摩擦與慣性(friction and inertia)具有積極的意義。我們不是闡述通融的空間的舒適，而是闡述空間所具有和引發的價值。

我們的觀點將通過圍繞威廉·米切爾的《比特之城》一書的討論展開，⁵ 因為我們從該書中能找到所有關於現代技術文化觀點的要素，尤其是有關精神境界的邏輯。米切爾的論述充滿誇張，很容易讓

³ 斯拉沃·茲查克(Slavoj Zizek)“多文化主義，或多民族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1997年，第225期，第36頁。

⁴ 劉易斯·A·薩斯(Louis Sass)，〈瘋狂與現代主義〉(Madness and Modernism)，康橋，麻省，哈佛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2-33頁。

⁵ 威廉·米切爾，《比特之城》(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康橋，麻省，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5年。

人視其想象的"比特之城"不過是未來科幻小說的幻想而已。但真正要討論的不是未來。米切爾的誇張實際上充分說明了當今對空間的一般流行看法。我們其實完全可以認為《比特之城》沒有任何讓人新奇的東西，它只不過是把有關技術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的熟悉而常識性的幻想揉雜在一起而已。書很有趣因為它很傳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因為它玩弄了一個小把戲，以預言的形式裝扮平凡的傳統。我們將在距離的前提之下審視米切爾的思想，看它會把我們帶往何處。

當今大多有關技術轉型的描述有一個基本達成共識的絕對主題，即關於距離的消除這個議題。人們期望新的虛擬媒介將----最終將----消除現實地理中固有的限制。許多評論者試圖實現一個持久性的烏托邦計劃，即超越人類有限的生存狀態以及空間範圍受限制狀態，促成這一熱望不是紙上談兵。米切爾·瑟裏斯(Michel Serres) 將此描述為"泛托邦"(Pantopian)理想--"一切場所(place)均在一個場所，每一場所都在一切場所，每一個場所既是中心又是邊緣"。⁶ 有聲稱新的虛擬技術在征服"距離統治"的過程中，讓我們能在任何地方與他人進行交流，因此能在興趣和愛好的基礎上（而不是在"碰巧的" 地理位置的基礎上）形成新的電子社區。人在新的虛擬網路中似乎與他人（也就是說通過虛擬網路與他人互動）更加密切。虛擬關係與密切、社會交流和結合的理想密切相關----這因此而被稱作是一個即時傳播、聯繫和"接觸"的時代。那麼，這也就是說新技術可以給予我們一個可以享受社會交往的空間，而這正是現實世界所不能給予的。當地理距離成爲人類傳播和社交的根本障礙時，技術類比上的成功似乎成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這是威廉·米切爾的《比特之城》的基本觀點。米切爾從"地理是天命" 的假定出發，試圖讓我們相信技術創造的虛擬世界所固有的烏托邦?能，用他的話說，這是一個"無形的世界"(incorporeal

⁶ 米切爾·瑟裏斯(Michel Serres) ，<傳向遠端的資訊>(Les messages a distance) ，魁北克，蒙特利爾，Editions Fides/Musee de la Civilisation，1995年，第22頁。

world)，在這個世界裏我們以"非實體的、斷片的形式(disembodied and fragmented subjects)"存在。他還告訴我們，這一創造的好處在於將使我們"從自然空間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以技術為媒介的新世界是一個具有"徹底的反空間"性質的後地理世界。因此現實世界那難以駕馭的有形性也將讓位於輕快的虛擬生活，我們也將結束"距離的專制"，最終克服因地理分隔與分離而造成的各種限制。"消除空間的互動"使得命運掌握在了我們自己的手中。

在考察米切爾闡述的以虛擬方式融於世界的本質的基礎上，我們來仔細思考一下這一切實際上意味著什麼首先他認為視覺途徑有了新的強度。新視像與視覺技術據說能為我們提供一個"電子視窗"，通過它，我們能看到整個世界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就這會，世界各地成千上萬大同小異的旅館的房間內全開著這同一個窗子。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功地用電子技術將它們組建成了一個龐大的、倒置的圓形監獄。"而隨著互聯網以其無數電子眼球置於其終端而成為"一個覆蓋全球、跨越時區的視覺網"，更新的技術將允諾更強的視覺途徑。新視覺技術似乎使距離變得沒有了意義。米切爾聲稱："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能隨時隨地在空間按自己的願望開設洞口。每一個與網路連接的地方都有另一個這樣的地方就在窗外。"從這一全球視覺通徑的理想之中，我們明白了什麼是虛擬的圓形監獄之想象。

但這不僅只是遙感式的看(remote-sensing gaze)。米切爾還聲稱，通過其他收縮距離的技術，還有望促成我們感觸世界的可能。

智慧的體外設備(比如資料手套，資料衣服，機器人式的假體，智慧性外附皮膚，等等)通過運用受控制的力量和壓力，能既感知形體語言，又充當接觸設備；在與商業夥伴談判時你可以在遙遠的盡頭與他握手，或者跟孩子道晚安時送去跨洲之吻。

米切爾說運用新技術的受動器和感測器，"你自身將融入這類比的環境之中，而不只是通過一個方形的小窗口窺探它而已……你自己就是其中的居民、參與者，不只是個旁觀者而已。"我們不斷被告之，"賽博空間的每一個地方都將以越來越多種感覺的參與方式展示自

己……我們將不只是看它們，我們還將感到身臨其境。"這種期望獲取"融入的、多種感覺的遙現(telepresence)"之願望----跨世界的接觸----再一次表達了"圓形監獄"式的理想。

至於即有視覺又有觸覺的途徑，問題的關鍵在於利用用來克服想象上的距離限制的遙控技術。米切爾認為這是合理的、現實的願望，而很多人似乎很樂意接受這一狂熱的想法。我們來思考一下他們所接受的到底是什麼。這一"圓形監獄"式的觀點在什麼背景下能成立？試問消除距離的願望以什麼樣的概念體系具有意義？我們認為，米切爾關於虛擬參與的本質的表述，只有在根據技術介面想象和處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的規劃之內才能成立。在米切爾的賽博規劃中，窺視注重的是監督與監視世界的的能力，而"遙現"是關於與世界互動及操縱它的能力。隨著這些功能的不斷交叉和一體化（實質上是技術系統中輸入輸出的功能），獲得更高的效率完全是可能的，因而在技術系統內極有可能實現"遙現"。米切爾是從創造一個一體化的技術線路的角度在思考："從穿在我們身上的姿勢感測器，到由通訊衛星和遠端光纜組成的全球性基礎結構，比特領域的各個元素最終將聚合到一起，形成一個緊密交織的系統。"最終我們將面對的是米切爾稱之的"我們賽博人"(we cyborgs)及我們的電子環境，比如"內部與外部之間的界限模糊了"，"自身和他者之間的區別要重建了"。我們認為克服距離的熱望表達的，正是這種在一個新的虛擬空間中改善介面、得以征服的渴望。

那麼從賽博邏輯的角度說，距離沒有位置。它在賽博系統的背景之內成了必須被消除的力量（它與降低系統效率的阻力和雜訊同屬一類）。在賽博想象中，從技術上消滅距離成為創造一種新的更好的技術文化秩序的先決條件。而隨著這一虛擬新秩序的建立，另一概念取代了距離----另一被稱作"遠距離出現"(presence at a distance)的概念。"遠距離出現"是一個賽博概念，現在已成當前有關虛擬未來的

流行話語中的主要神話。⁷在"遠距離出現"的世界裏，系統排除一切未知性、陌生性和排他性--所有因距離而造成的他性特性。"遠距離出現"是通過技術合成實現直接傳播---在另一虛擬世界非物質的環境中重新創造一個可直接面對面交流的社區環境。它需要類比即時，以便能以此來作為衡量世界的標準。所有距離都不存在了，虛擬世界被看成是一個普遍的、全球性密切接觸的地方。

對距離（不利）和密切（有利的）如此簡單的論述即有意義又存在問題，它將自己展示成了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觀點的根基。米切爾幾乎完全在"遠"技術固有的超越空間的能力的基礎上繪製了一個想象的"新"社會---新虛擬密切政治(a politics for new virtual intimacies)。他順著預見的思路，聲稱全球電腦網路的興起"將破壞、取代和徹底重新定義我們的關於聚集地、社區和城市生活的觀念。"重要的是人的位置在以我們的方式構建的社區中已不是問題：隨著能從遠處感知和反應並且部分地停留在自己直接的環境中的電子擴充、重構的虛擬身體"的出現，所有新的社會互動的可能均已做開。"今天"，米切爾說：

"當遙現不斷增加並時常取代有形的出現時，當越來越多的商業和社會互動轉入賽博空間時，我們發現接近途徑越發不必依賴地理位置的相近，而社區越發與地理剝離 社區正越來越在賽博空間，而不是在天地之間找到它們共同的土壤。"

米切爾從自己的探索中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即這樣的虛擬社區因為新技術的特性，在它們的社會性質上一定是新穎的、創新的、悅人心意的。現在的普遍認識是，技術創新應該與社會創新連在一起---這一認識已達如此強烈的地步，以至於禁止任何懷疑技術創新固有的潛能可能會被驅使著使得社會變得保守的觀念。只有這一力量才能解釋新

⁷ Jean-Louis Weissberg, "英特網，一個烏托邦式的故事" ("Internet, un recit utopique"), <終端>(Terminal) , 1996, 第 71/72 期。亦見 Jean-Louis Weissberg 的"知識、能力和數位化網路" (Savoir, pouvoir et reseaux numerique) , <終端> , 1995 年, 第 67 期。

技術文化的誇張爲什麼總能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它貧乏、倒退的社會哲學的本質核心上轉移開來。新技術規劃培植的實質上是一個社會、政治上的共產主義規劃。像哈拉斯姆（Harasim，以及她的"人們的新集聚地"的網路世界）和格拉漢姆（以及他的"密切的關係聯繫"）一樣，米切爾關注的也是可能出現的虛擬社區、具有共同興趣和價值觀的人們之間電子束縛的前景。（他的問題是個社群主義的問題："社區該如何界定它們的界線，如何在界限之內能維繫它們的標準？"）。很清楚，米切爾的"虛擬聚集地"即便分佈在賽博空間，也是從一個非基本的理想角度構建的。虛擬未來主義與懷舊的社群主義之間似乎有一種奇怪的聯繫。

技術文化固執地想要消除所有距離的抱負，實際上是希望通過技術手段使艾麗絲·瑪裏安·楊(Iris Marion Young)（米歇爾·福柯的追隨者）稱之的"盧梭式夢想"(the Rousseauist dream)--"一個全然透明的，其中的每一部分均可視、可辨的社會"的夢想、一個"不再有任何黑暗區域……混沌區域存在"的夢想---得以永存。⁸技術文化試圖通過創立虛擬社區來重新確認盧梭的透明社會的理想，在這樣的社會裏，"人們不再有差異、不再難以溝通和理解，而是相互和諧，像理解自己一樣地理解他人。"而且它也表述了直接交流的渴望："直接比間接好，因爲直接聯繫包含盧梭式夢想所渴望的純粹性和安全感：我們彼此透明，共同存在於同一空間，密切得足以接觸，沒有任何東西能遮擋我們相互之間的視線。"⁹這難道與米切爾那內外界限已經模糊、自身與他者間的區別已經消融的密切的"比特世界"不是如出一轍嗎？

盧梭式夢想無疑具有某種誘惑。但它之所以具有誘惑性是因爲它

⁸ 艾麗絲·瑪裏安·楊(Iris Marion Young)<正義與差別的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新澤西，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1990年，第229頁。引自米歇爾·福柯的<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紐約，Pantheon，1980年，第52頁。

⁹ 同上，第231、233頁。

能象夢一樣把現實世界的狀態暫時撇開。盧梭主義式工程包含兩個概念，其一是否認現實，其二是從想象中的"不可理喻的無序"的世界中退出。正如瓊·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對盧梭所作的評述，"因為他夢想完全的透明和直接的交流，他因此必須切斷一切將他束縛於惱人的、到處充滿煩人的影子、遮掩的面孔和不解的目光的世界的聯繫。"¹⁰促成盧梭主義式工程的，是這樣一種渴望，即渴望消除一切差別與他性。盧梭不容忍"人類受束縛的狀態--在這一狀態中，交流的可能總因有受阻礙和誤解的危險而被抵消。"而且"如果每一現實都更有可能遇到障礙，那?他寧願傾心不存在的東西。"¹¹盧梭認為世界應該是一個沒有障礙的空間。J-B 波泰裏斯(J-B. Pontalis) 中肯的觀察表明，盧梭雖然生活上離經叛道，但思想卻不活躍："盧梭天馬行空。矛盾的是他來來往往尋求的不是奇異與不同會增強他們的改變的其他的人，而是立即生活於遠離'他者' 的機會。"¹² 這個世界，連同它的障礙與無序，被視為是個要從中退出的地方。

我們從此得出什麼結論？技術文化渴望擺脫地理的重負，因為它認為天然形成的地勢一直是人類生活中種種挫折和限制的根源。它試圖另建一個它認為更通融的"反空間"秩序來取代那個難以駕馭的世界。一個新的不同的空間--中立的、平靜的空間----取代了另一個空間。其征服是以丟失現實世界為代價；也就是說做出的這種選擇有利於"不存在的那個世界"。總體說來，虛擬文化是一種背離現實世界、背離現實世界中人類參與的經歷與意義的狀態的文化。我們也許可以從日益增長的否定----即從智性上又從技術上----的角度來思考它，思考現實社會和社交中真正的複雜與無序。人們向往的秩序是一個能在這樣的王國裏建立的秩序，即現實世界的危險在這個王國裏----一個

¹⁰ 瓊·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 <盧梭:透明與阻礙>(Jean-Jacques Rousseau: Transparency and Obstruction),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1988年, 第41頁。

¹¹ 同上, 第252、222頁。

¹² J-B 波泰裏斯(J-B. Pontalis), <心理分析尚待研究的領域: 在夢與精神痛苦之間>(Frontiers in Psychoanalysis: Between the Dream and Psychic Pain), 倫敦, Hogarth Press, 1981年, 第121頁。

擯除了煩人的影子、遮掩的面孔和不解的目光的領域----不再存在。

虛擬文化是一種退出現實世界的文化。但我們想要申明的是，這種退卻邏輯或曰退卻誘惑遠不止是個虛擬文化問題。顯然，我們關注的是我們與目前這個正遭遇新資訊與傳播技術發展的世界之間的關係的轉型問題。丟失----或曰否定----現實是一個具有比較深遠的根源的現象----因此必須把它放在一個超越狹隘的虛擬技術討論的範圍來加以考察。多琳達·奧切姆(Dorinda Outram)把丟失距離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有意義的現實，放入一個有趣的歷史角度。她意識到當前讓人們"關注什為是他者，什麼是時間或空間中的他者"¹³ 的困難，於是將淡化他者的思想萌芽定位於 18 世紀。在思考這些萌芽思想的過程中，她對"啓蒙運動" 後期（也就是盧梭時代）流動性含義中轉型的重大意義作了評述。多琳奧切姆認為，這一時期對自身的越發關注伴隨了感知外部現實的削弱--"將現實感丟失'在了那裏"。而這一削弱又導致對世界的流動性越發焦慮。奧切姆以此為背景，指出了旅遊文學的時代意義，並中懇地評述了啓蒙運動關注旅遊的思想與烏托邦式幻想的密切關聯："流動的思想與逃離是聯在一起的，希望無止境地游向他方，這個他方其實是烏有之方。在這個烏有之方，也就是烏托邦裏，人們可以暫時忘卻現實世界的侵蝕"。(我們這裏想指出的是，取代現實的欲望同樣是出于這種焦慮)。奧切姆在論述啓蒙運動中的流動史時繼續指出這個問題仍需討論：

這是一段展示了世界觀真正發生重大轉變的歷史，它見證自羅馬帝國或甚至更早時就已存在的在思考流動的問題上的衰落直至最終的崩潰。這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歷史轉變。它也許告訴我們，最終的爭論焦點在變遷的意義和空間的潛能上。

我們在思考距離的意義發生了什麼變化時，當然必須以這一歷史轉變作為一個關鍵的參照點，認識到這一轉變遠遠發生於現代傳

¹³ 多琳達·奧切姆(Dorinda Outram)，"啓蒙運動的旅程：從宇宙旅行到內心空間"(Enlightenment Journeys: From Cosmic Travel to Inner Space)，研究地理概念的形成過程的國際團體研討會上的論文，Royal Holloway 學院，1996 年 9 月 5-7 日。

播技術發展之前。

但傳播技術的發展當然隨之與這一經驗形的轉型產生密切聯繫。我們因此應該從這一流動性的視點和變遷的意義的角度來思考它們的重要性。首先，傳播技術朝中立化空間的方向發展。黑德格在論述 20 世紀初期的新交通體系和媒體技術（廣播和電視）時，對新空間的創立給予了清晰而深邃的評論。"時間和空間的一切距離都在縮小"，他說，"人類以最短的時間將最長的距離置於其身後"。¹⁴這一技術創新產生的結果，是創立了"一個沒有遠近之分的世界。沒有距離得以形成"。¹⁵ 這種沒有距離的狀態有什麼意義呢？如果真的消滅了距離，一切均無遠近之分，那麼這裏將會發生什麼呢？"¹⁶ 這都是些最基本的問題。隨技術消除了距離的概念一起帶來的，是虛幻的緊鄰感和密切感。技術造就的密切感與接近沒有任何關係，因為接近與距離短沒有關係：

從距離的視點說，借助電影的圖像或廣播的聲音而離我們不遙遠的事物其實可能離我們非常遙遠；從距離的角度說離我們遠得無以測算的事物也可能讓我們感到非常接近。距離短本身並不表明接近。距離遠也不一定表明疏遠。¹⁷

這個技術導致虛幻的密切感的世界，同時又是一個我們都希望"消除一切疏遠可能"的世界。沒有接近就沒有疏遠—為"保持遠"，近是必不可少的。¹⁸這些都是重要的論述，與那些有關距離及征服距離的平凡的常識性認識截然相反，對企圖消除具有人性意義和價值的疏遠的荒謬的欲望提出了挑戰。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在一個即沒有近也沒有遠的世界，在審美和道德上還有什麼意義基礎。

¹⁴ 馬丁·黑德格(Martin Heidegger)，"事物"(The thing)，載< 詩歌、語言、思維 >(Poetry, Language, Thought)，紐約，Harper and Row，1971 年，第 165-66 頁。

¹⁵ 同上，第 177 頁。

¹⁶ 同上，第 166 頁。

¹⁷ 同上，第 165 頁。

¹⁸ 同上，第 165、178 頁。

其次，技術的發展極大地促成了空間經驗的平定(pacification)，即促成了關注的丟失，也就是說根本不留意空間和時間中的他者。技術造就的密切其實有孤立我們、使我們沒有了被他人接觸的可能。李查德·森尼特(Recharad Sennett)曾從這種角度論述過交通技術的發展。他堅持認為在 20 世紀，汽車因此"使人與他穿越的空間分離……"。將坐姿限定在一個固定位置並只需做一些微小動作的駕駛行為，從身體上平定了駕駛者"¹⁹技術構建的這種"封閉空間"，使我們能管理和控制我們逐漸認為的我們與現實之間的"介面"--"被動移動的人很可能會失去所有與外部世界的有形聯繫"²⁰。新的虛擬行為---在虛擬空間旅行---會極大地擴展這種可能。因為它們提供了新範圍的流動，同時更高效、更系統地促使了與現實世界的分離---進入一個終極的封閉空間。吉勒斯·查特裏特(Gilles Chatelet)論述過如"賽博蟲"般的"恆溫器式居民"的出現。²¹虛擬文化允諾的，是完全能滿足人們有效地脫離世界、躲避世界的欲望的另一個空間--一個有可能會，也許現在還不能確定，繼續忽略世界的現實的侵蝕的空間。虛擬空間中的無距離感確實帶來控制感--資訊空間中的一致性取代了充滿活力和經驗的空間。那個"比特之城"--平定的技術空間--將是被動活動的人最後的生活空間。在這種空間裏變遷還有什麼意義？

當今圍繞虛擬技術的敘述和討論，集中在新技術文化秩序的潛能上----"我們重創了人類的居留地"，威廉·米切爾說。我們的觀點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新技術通過消解有意義的外部現實，促使了真正的社會生活與經驗資源的枯竭。目前我們並不期待中斷技術上縮小距離的革新性擴展--絕大多數人（或曰足夠多的人）在虛擬生活的前景中尋找到了舒適。況且我們已指出，爭論的根本所在--當代試圖逃脫"在那

¹⁹ 李查德·森尼特(Recharad Sennett), <肉體與石頭: 西方文明中的人與城市>(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sation), 倫敦, Faber and Faber, 1994 年, 第 365 頁。

²⁰ 同上, 第 349 頁。

²¹ 吉勒斯·查特裏特(Gilles Chatelet)(Relire Marcuse pour ne pas vivre comme des porcs), (Le Monde Diplomatique), 1998 年 8 月, 第 23 頁。

裏"的一切的意向----不只是個技術"依賴"問題，而是具有比較深厚的精神-文化根源。我們的反對立場實際上不是（或以任何簡單的方式）反對這些新技術。而是指出要記住並認識到，涉及技術的問題從根本上說絕不僅僅只是個技術問題。它意味著抵制技術文化提出問題時受約束的、容易得到的條件，也就是說進步和進步所帶來的能力與征服的條件。也意味著把討論轉向更豐富更確實的社會和政治分析領域，有關密切、直接和社區的理想的可信度在這個領域大打了折扣----在這個領域它有可能促成更複雜、更具挑戰性的反對它們的社會價值。要駁斥技術是衡量一切的標準這一邏輯，我們首先就得在技術帝國之外確立一個理性的、批判性的有利視點。

看一看目前有關空間和距離問題爭論的焦點在哪裡。技術文化已經告訴我們所有新的潛能：流動與"遠距離出現"的可能、賽博空間令人難以置信的旅行的可能、在新的電子"集聚地"與其他所謂的賽博人虛擬會面的可能。我們認為應該思考這種在壓縮的時空中旅行的本質，並且需要在一個比較寬泛的反映變遷的意義的背景之下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因為這似能開闢新潛能的技術體系，其實很可能在進一步的發展中關閉掉更多的潛能。虛擬文化試圖建立的是一種抹去了面對面的形式的傳播與遠距離形式的傳播之間的區別的空間秩序-一種直接傳播成為所有傳播模式的空間。阿爾·戈爾認為互聯網構建了"一種全球對話形式"，其意義在於"在地球社區一般的空間裏共用資訊、相互聯繫、相互傳播"。²²"那裏"的世界被構思成是一個密切的、社區般的（由一致的世界構成的）世界。它只不過是個一切均知曉、熟悉且可以預測的狹隘的範圍。這是一個距離和它的他性被轉變成表面的相象和虛假的密切的空間。從這點出發，我們認為技術文化工程應被視為是一個試圖魔法般地控制距離以及想象中的關於距離的破壞性潛能的規劃。虛擬文化在廢除變遷的意義。

²² 阿爾·戈爾(Al Gore)，"打造一個新的民主的雅典時代"(Forging a New Athenian Age of Democracy)，<媒介物>(intermedia)，1994年，第22卷，第2期，第4頁。

距離的價值是什麼？我們在什麼基礎上才能挽回距離的意義？加布裏埃爾·喬西波維奇(Gabriel Josipovici)在《接觸》一書中對這些問題提供了一種答案。他在思考他很重視分隔的經驗性潛能時指出，我們應該從"距離療效"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為說明他指出的距離可以衍生出感覺和意義這一觀點，喬西波維奇應用了朝聖的經歷，一種被認為是：

體會經歷本身的旅行。當朝聖者在他或她漫長的旅行之終觸摸到聖地時，他們並不試圖跨越阻隔他或她與聖地的距離，而是本能地體驗這段距離。²³

喬西波維奇當然看到了現代性的產生損毀了朝聖的意義，使距離成了敵人。但他相信這種意向仍然根植於人與世界的聯繫之中，且認為距離在當代社會仍是一種被利用的現存資源。喬西波維奇提到自己第一次訪問洛杉磯時的衝動--把手浸入大西洋裏。他說為什麼他覺得光看還不夠，還需要接觸呢？

那一天的舉動留下的記憶(他說)幫助建起記憶中的我與現在的我之間的距離，建起記憶中的他性、不可思議的博大與古遠，因而使之在我居住的世界中也成為真實的存在，因而幫助建立起它會保持與我的所有想像完全不同的概念。²⁴

距離與缺席依然會有有意義的關係。喬西波維奇認為，我們不應該追求從技術上的消除距離，而是應該"復蘇距離"。

喬西波維奇提出了與距離有關的他性的特徵這一重大議題。面對在"思想類同"的社區內建起無數密切的"鏈結" 這一日益高漲的虛擬理想，我們要認真對待這樣一個關鍵性問題，即所有真實的經歷都是他者的經歷。我們還得注意喬西波維奇關注的問題，即距離消除後會發生什麼。"當消除真實的旅行連同與其相隨的所有危險與吸引、魅力與誘惑以後，距離療法也就被消除了"他說。而他所說的"任何東西

²³ 加布裏埃爾·喬西波維奇(Gabriel Josipovici)《接觸》(Touch)，康奈狄克洲，新哈芬市，耶魯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68頁。

²⁴ 同上，第71頁。

替代不了距離療法"無疑是完全正確的²⁵。(這一療法被消除後，取代它的是技術的虛假療法)。但這一論點無論有何裨益，它同時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因?喬西波維奇的思想充滿了對往昔的留戀。他現在所堅持的，只是他認為只有在前現代(pre-modern)的往日才能真正得到的殘留而已。我們不得不思考用其他的瞭解世界的方式來理性地佔據世界這一進步帶來的後果--思考經驗與想象的丟失問題。喬西波維奇的另一重新確立他性的觀念似乎存在於上帝與自然之中。但我們很難想象神力或浪漫崇高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極具理性的或存在上的中心。這肯定不是挽救距離的辦法。對技術文化來說，它不是另一有意義的途徑。

挽救距離只能在社會和政治工程的背景之下。必須提出一個政治上的觀念來取代那令人發膩的有關虛擬密切、熟悉和社群主義的觀點；來取代賽博空間中鬆散"鏈結"和"結合" 以及通過互聯網進行"全球對話"的平凡的理想。因?它相信能共用、合作、互動等等，這個善意的觀點其實顯得很愚蠢----是一個絕對反社會、反政治的觀點。因為賽博空間，包括它那無數的小互動社區，是一個你得到確認和認同後才會去的地方。而社會和政治生活絕不只是確認和贊同--它需要距離。喬西波維奇關於他性的重要觀點，就是他性代表了我們自己的想象以外的東西。我們認為這個"以外"的重要不僅表現在喬西波維奇曾經歷的幾種經歷中，也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經歷中。與他人交往不僅只為確認，還為轉變。我們可以根據克裏斯托弗·波拉斯(Christopher Bollas)的觀點，從轉變目標關係這一角度出發來思考社交--他者提供的可能的關係並不一定是佔有的關係，而是"在這一關係中，目標被作為一個改變自身的媒介來追求，以使自己轉向目標。²⁶" 這種關係需要放棄同化或控制目標的自我崇拜的欲望--也就是說它需要認識到自己基本的他性及因為自己的距離而造成的經驗的可能

²⁵ 同上，第 75 頁。

²⁶ 克裏斯托弗·波拉斯(Christopher Bollas)，〈物體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Object)，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7 年，第 14 頁。

性。距離療法蘊含於使人轉變的經歷之中--如果變遷有意義，它的重要就在於此。

我們這裏引用的從根本上取代虛擬社區新政治的觀念，是艾麗絲·瑪麗安·楊描述的政治，它"被設想成是一種跨越時空的、由在主觀和直接感覺上彼此不能理解的陌生人構成的關係"。²⁷民主文化其實是建立在陌生人之間的差異和距離的基礎上。讀一讀雅克·蘭茜爾(Jacques Ranciere)敏銳、系統而確切的陳述，他說，"民主對話……和曼德爾斯丹定義的詩歌對話(Poetic Dialogue)相似：對話者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而對話者的不確定性----即他表情的不可預測----也是必不可少的。("對話者"不是"夥伴")"。²⁸民主是以分歧為前提的對話：

不滿是真正衡量他性的標準，是統一對話者的同時又使之保持一定距離的東西。曼德爾斯丹關於詩歌對話的論述在此又可運用到政治上：這不是聲學上的問題，而是一個距離的問題。是他性而不是其他別的東西賦予語言遊戲以意義。同樣，正如所周知的，將新政治建立在有限的、概括性的他性之上，建立在以多種網路重新指引傳播機器的流動的基礎之上的夢想，只能帶來失望的結果。²⁹

面對這種情緒化的一致與社區的理想，重要的是要保護有對抗的民主這個更為強烈的原則--"一個只能在衝突中發生的聚合"："民主既不是利益間的妥協，也不是形成共同的意願。其對話形式是一個存有分歧的社區的對話形式。" 認識到並接受政治文化的這一對抗基礎的人，認為新技術文化的理想肯定即受誤導又受誤解。他們一定堅持以這些他者的、對抗性的原則為衡量標準來判斷虛擬文化的抱負與成就。

²⁷ 楊，前面所引著述的第 234 頁。

²⁸ 雅克·蘭茜爾(Jacques Ranciere)，〈論政治的範圍〉(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倫敦，Verso，1995 年，第 102-3 頁。

²⁹ 同上，第 104 頁。

Distance as a Value

Kevin Robins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s,
Goldsmith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Frank Webster

Professor of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Translator:

Zhaoyang He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Xihua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Chapter 11 from the book *Time of the Technoculture----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Kevin Robins and Frank Webster analysed the virtual spaces and the network space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in and through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They centered their argument around a discussion of William Mitchell's book, *City of Bits*, which presented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modern technocultural vision. *Contra* Mitchell, Robins and Webster held the opposite view. They did not think virtual spaces have reinvented the human habitat. They regarded the new virtual space as banal and pacified. In contrast, they proposed the argument that the new technologies may contributed to the depletion of the real resources of social life and experience through the erosion of significant external reality.

